

四川著名碑学书家

包弼臣 余沙圃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第四辑） 侯开嘉 赵仁春○著



巴蜀著名碑学书家

包弼臣 余沙圃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第四辑）

侯开嘉 赵仁春○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川著名碑学书家：包弼臣 余沙园/侯开嘉，赵仁春著. —成都：巴蜀书社，2009.9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 第4辑)
ISBN 978-7-80752-434-2

I. 四… II. ①侯…②赵… III. ①包弼臣 (1831—1917) —人物研究②余沙园 (1880—1940) —人物研究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5017 号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
四川著名碑学书家：包弼臣 余沙园

侯开嘉 赵仁春 著

责任编辑	李 嘉 陈亚玲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 86259397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028) 84122206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38mm×203mm 1/32
印 张	4.5
字 数	1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434-2
定 价	1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任：张作哈

副 主 任：唐建军 张在德 王 伟

主 编：张在德

副 主 编：罗韵希 段志洪

编委会成员：唐建军 张在德 任 杰 梁清海

康济民 安 山 伍 文



总 序

张中伟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缕，形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四川，乃至中国的一座极为珍贵的文化宝库。

巴蜀文化植根于巴山蜀水，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自上个世纪40年代初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以来，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古迹相继发现发掘，巴蜀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并陆续在历史文化、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成果。这是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视发掘、研究巴蜀文化，大力普及、弘扬巴蜀文化，既是结合我省实际、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文化生活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既是发展繁荣我省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省的有机内容，也是加强和推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精神的重要途径。为此目的，省政府组织参事、文史馆员等一批学有所专长的老专家、老教授编写了《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这套丛书涵盖了巴蜀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科学技术、民风民俗、名都名城名人等诸多方面，史实准确，文字精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对普及、宣传和弘扬巴蜀文化，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相信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从中领略到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弘扬巴蜀文化，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大力开展宣传普及工作。坚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希望全省学术研究和文化界的同志始终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化精品，为推动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引 言

清代碑学，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段时期里，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趣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清王朝的建立，经过了初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了巩固确立，取得了政治上百年相对稳定的局面，而且又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和政策，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了进一步的生长，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政治上的稳定统一，必然为文化的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经济上的繁荣，也必然为文化的兴盛提供物质条件。另外，由于要巩固其少数民族贵族统治的政权，清政府对内实行了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龚自珍诗句），多数的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纷纷钻进了琐碎的训诂考据的圈子里。

在上述三种因素的影响下，文艺界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文化思潮。一种文化思潮是提倡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如考据学上的“乾嘉学派”；文坛上的“桐城古文派”；画坛上的“四王”；书坛上的帖学颀风等，都是其代表。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种文化思潮，表现在对清政权黑暗残暴的间接或有意无



意的反抗，对现实的揭露，对时政改革的诉求，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渴望。因此，产生了《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这一类的文学名著；出现了庄存与、刘逢禄、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人倡导的“今文经学派”；出现了朱耷、石涛、金农、郑板桥、李鱓、华岳、任伯年、吴昌硕等一大批著名画家，而碑学则在书坛趋势而起，形成了影响一代的嶄新书风。这种新兴的文化思潮，在清代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特别是在社会危机加深，历史发生重要转折时期反映得尤其强烈，从而逐渐取代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化思潮。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碑学的产生是对帖学颓风的反叛。“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①由于清帝王个人的喜爱，董其昌、赵孟頫的字体在全国泛滥，科举制度倡导的“馆阁体”使书法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艺术性几乎泯灭，帖学已流落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了。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当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快到尽头时，另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已在酝酿中产生了，这种现象在文艺发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帖学精华几于泄尽时，一批有识之士早就在千方百计地寻求开拓书法艺术的新天地了。引发书法变革的直接契机，是大量的古碑志的不断发现。清代早、中期，“乾嘉学派”的学者们为了考经证史的需要，竭力去搜集金石碑碣，情况如康有为描述那样：“专门搜辑著作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

① 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二《体变第四》篇。

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彩，摹拓以广其流传。”^①于是，研究金石的著作如《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志》、《金石萃编》……殆难悉数，加之出土的古碑源源不断，这就不能不引起书法家们的高度重视，因为这种盛况是清代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正当一些书法家力图开辟书法新天地时，出现了这一大批古文字资料作为借鉴，无疑能使他们得到极大的启示，直接影响了他们书法创新的走向。以郑谷口、金冬心、郑板桥等人最早开启学古碑的风气，在书法作品中糅合进篆隶的写法，形成了一派古趣傲岸的风姿，表现出与“乌、光、方”的馆阁体强烈的对抗；继而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布衣书法家邓石如，他抛开了令人可厌的帖学，刻苦向篆、隶、汉碑额、古碑志学习，并独创其“运指、卷毫”的新笔法，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兴起的碑学在实践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理论上，阮元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继而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写出了显赫一时的书法理论著作《艺舟双楫》，把邓石如创造的新笔法公布于世，这在大家都在黑暗中探索书法发展趋势的年代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邓、包的影响下，何绍基、伊秉绶、李文田、赵之谦、张裕钊、吴昌硕、沈曾植、李瑞清等一批豪杰之士兴起，各自在书法上取得了不同的卓越成就。另外，一个在我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康有为，他在包世臣《艺舟双楫》一书的基础上对北碑进行了总结，写出了一部《广艺舟双楫》。书中大力

^① 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一《尊碑第二》。



提倡北碑，宣扬北碑有“十大美”，使碑学在帖学之外自成体系。虽然，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他们的书法理论并非无偏颇之处，但是，谁也不能否定他们在清代中、晚期书坛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对馆阁体的颓风起到了摧毁性打击。这样，清代的碑学从理论上的建立和实践上的探索成功，转换了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趣味，使清代中、晚期成为书法美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时期，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呈现出光辉灿烂的一页。

当时的四川，由于地理上远离京都与安徽、江浙一带，碑学在四川流行较之稍晚，首先把北碑的风气带进四川的当推我省著名的书法家包弼臣。他在北京时与新兴的碑学思潮一拍即合，并受碑学名家李文田等人的直接影响，师承北碑，把魏碑的笔法和帖意糅为一体，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包体”。他指导自己的儿子包崇祐专攻魏碑，文献中曾这样记载：“（包崇祐）书法宗魏碑，学使张之洞见其书大加奖誉，常以所书纨扇示人。初，蜀人学书囿于王、米、赵、董，自是始渐有模仿北派者。”^①虽然包弼臣独具一格的包体和对碑学的倡导，给四川书学界带来耳目一新之感，但是也遭到了一些守旧者的攻击和歧视，认为他是“狂怪”，是“左道旁门”，因此，包弼臣在一片流言飞语之中落得了一个“字妖”的名声。

真正的艺术是攻击不倒的，包体很快就得到人们的喜爱，在四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包体出现以来，碑学在四川逐渐风行一时，从清代光绪年间到民国期间，

^① 见《南溪县志·包崇祐传》。

四川涌现出一批有名的书家，如吴之英、陈楚珮、赵熙、杜关、颜楷、余燮阳、公孙长子、余沙园、谢无量、刘咸炘等，像星汉灿烂相映争辉，使四川书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包弼臣的先导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一时期四川书法艺术发展的概况，对以下这批碑学书家群体作一简略地介绍：

吴之英（1857—1918），字伯喈，号西蒙愚者，四川名山县人。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吴之英被选拔入学。因学业优异，与廖平、杨锐、宋育仁被人称为“院中四杰”。光绪十八年（1892）任灌县训导兼尊经书院讲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宋育仁执长尊经书院，发起组织“蜀学会”支持维新变法，创办《蜀学报》，吴之英任该报主笔。因“戊戌变法”失败，遂退隐山林，不与世闻。宣统二年（1910），成都开办存古学堂，吴之英受聘任教。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蜀政府1912年秋设立国学院，吴之英受聘为国学院院长。1913年吴因体弱多病辞职回乡，1918年逝世，终年61岁。吴之英书法在蜀中享有盛名，他早年习唐楷，后受碑学思想影响，习魏晋碑志、两周金文及汉隶，最终将碑体、行草融为一炉，自成一家，具有一种高古沉雄的风格。1915年，成都少城公园修建“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丰碑，碑身四面的碑名十个擘窠大字由四川四位著名书家题写。碑身南面带有篆隶笔意，古劲雄道的十个大字即为吴之英的手笔。

陈楚珮（1857—1921），名先湖，四川筠连县人，

出生于官宦读书之家。清末任叙府中学（今宜宾一中）第一任校长，民国二年任筠连县县长，后返叙州任府署司法官，民国七年任叙府卫戍司令部高等顾问。民国十年卒于宜宾，终年 64 岁。他少年时即以书法名世，13 岁便为人书寿屏，得资以助学。晚年时在鬻书《润例》中称：“无论汉魏晋唐诸碑，篆隶楷行各体，笔飞墨舞，俱能超妙入神。”他的书法结体受黄庭坚和北碑的影响，自成一格。用笔为圆劲瘦硬一路。曾自书一联：“品同姜桂无妨辣，味到芩连不取甘。”实是夫子自道，他的书法已达到一种生辣挺劲、潇洒健纵的境界。《县志》记载：陈楚骖“清末民初，与南溪包弼臣同以书法名噪当时”。他留下的书迹较多，在川南一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赵熙（1867—1948），字尧生，别号香宋，四川荣县人。自幼天资聪慧，勤奋读书。17 岁中秀才，24 岁中举人，25 岁中进士，入仕为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倾向维新，与川人刘光第、杨锐交谊甚笃。政变时，因回川守孝而幸免于难。宣统年间，为督察御史。上奏弹劾庆亲王奕劻及四川总督赵尔丰，又请为杨锐昭雪冤狱，惊动朝野。民国成立后，回川乡居，从事教育和文艺，以书画诗文而名噪当时。赵熙的书法，早岁出于颜真卿、赵孟頫和欧阳通，后泛涉六朝诸碑，得力于《张猛龙》尤多，最终融合碑帖，自成一体。风格秀逸峻密，饶有书卷味，仿效者不少，人称“荣县体”。榜书大字雄厚峻整，48 岁时题书“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乐山乌尤寺所存赵熙楷行书石刻甚多。《中国书法》1988 年第一期曾介绍其书法艺术。



杜关（1864—1929），原名杜德舆，字若洲，晚号柴扉野老，四川长宁人。光绪十二年（1886）考取秀才，光绪十八年（1892）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光绪二十年中举人，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杜关一生忧国忧民，悉知甲午战争失败、清廷与日本签订了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曾悲愤作《哀辽东赋》，而被广为传播。1905年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更名为杜关。1912年任民国临时政府内务部礼俗司司长。因宋教仁被刺，袁世凯蓄谋帝制，杜关愤而辞职。1914年回川定居成都。1919年被选为四川省议会议员。感于军阀混战，川乱无已，其主张与时事相悖，因而失望退隐。1923年在通顺桥畔筑一草庐，大门自撰自书一联：“小楼斜日樊川宅，老屋秋风工部家”，杜门不问世事，唯与朋辈以诗酒琴书相娱。民国十八年病死成都，享年63岁。所遗《柴扉诗草》半皆为感时忧世之作。杜关的书法，品格甚高，能独树一帜，享有盛名。书体出自汉魏、《好太王碑》及《爨宝子》等。用笔方圆兼并，流畅不滞，深厚雄健，富有金石趣味。擅长擘窠大字。现长宁竹海“仙寓洞”及乐山大佛寺还存有石刻书法遗迹。《书法研究》1992年第一期曾介绍其生平及书法艺术。

颜楷（1877—1927），字雍耆，四川华阳人。出生于宦宦之家。14岁侍父入京，拜识了许多文人学士。16岁以第二名考上清廷的贵族子弟学校“南学”，受到翁同龢的赏识。后又于衢州东州书院师从王闿运，也颇受器重。在京时，正值甲午之战惨败，他耳濡目染，受到了维新思想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时，他目睹父执杨锐、刘光第等人遇害，深受刺激。26岁中举人，27岁

中甲辰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5年后被派往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法政。两年后归国，仍入翰林院，加侍讲銜。1909年调赴广西协办新政。1911年回成都完婚，时值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兴起，被推为铁路股东会会长，并承担保路同志会干事长。领导保路运动，与当局抗争，险遭川督赵尔丰的杀害。辛亥革命后，闭门读书，无意仕进。1914年主持四川公立政法学校，任校长。办学认真，成绩斐然。1918年辞职归家，以鬻字为生。书法早年习馆阁体，后受碑学影响，致力于两汉及南北石刻，善篆、隶、楷、行，尤以楷行书成就最高。书从《爨龙颜》、《张猛龙》中化出，用笔奇逸纵横，天骨开张，结字朴拙奇崛。当时四方求字者甚多，影响颇大。川内各地名胜寺庙常见其书迹，如青城山天师洞、昭觉寺、文殊院、宝光寺等都陈列其所书的匾额、对联。成都少城公园矗立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正面碑文大字即是其手笔。《书法》1991年第一期曾介绍其生平及书艺。

余燮阳（1877—1944），四川内江人。前清秀才，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入京后因善书法被推荐任军机处章京。后又转入京师法律学院学习法律，与沈钧儒同学，因而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委任成都法院推事，不久又改调重庆法院。1934年辞归。在内江行律师职，兼以卖字为生。抗战时于右任过内江，人请写字，于说：“余燮阳先生在此，我不好下笔。”以显推崇之意。冯玉祥曾到内江延请余卖字为抗战捐助，收获甚丰。余燮阳书法初学汉魏碑，继学《兰亭》，兼学十三行，数十年如一日，最终碑帖兼融，形成一种精练而秀



挺、遒劲而自然的艺术风格，在川内名重一时。

公孙长子（1881—1942），四川内江人。本姓余，名兰陵，字佩书，又名余切，字培初，公孙乃黄帝之姓，谓之黄帝之子孙也。1906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的民主革命。1931年寓居成都，鬻字为生。以长于魏体楷书而鸣世。其实他于篆、隶、真、草各体皆工，于《龙门二十品》功力尤深，并创压线双钩书法，堪称一绝。青城山天师洞刻有早期魏体书长联。笔者又曾见其行书，以圆笔内敛的魏碑笔法书之，与楷书方笔迥异。其纵横跌宕、沉雄纵意，甚有艺术特色。

谢无量（1884—1964），名大澄，字仲清，别署菴庵，四川乐至人。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1900年在上海入南洋公学，深受蔡元培器重。1903年东渡日本求学。1906年回国任《京报》主笔。1909年返川，在成都主持存古学堂，复执教四川高等学堂。1912年潜心为中华书局著书十余种，其中《楚辞新论》、《中国哲学史》、《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等著作陆续问世。1923年到广东国民革命大本营辅佐孙中山，任秘书、参议等职。1927年应聘去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03年应于右任之聘，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创《国难月刊》于上海，呼吁团结一致、抵御外侮。1938年避寇还蜀，在四川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任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川西博物馆馆长等职。1956年赴北京任人民大学教授。1960年任全国文史馆副馆长。1964年12月10日因患心脏病逝世，终年80岁。谢无量先生一生酷爱书法，自成一格，人称“孩儿体”。成功之处在于学古人



而不露声色，似无迹可寻。事实上他的书法从钟、王及六朝碑版化出。笔者曾见西安碑林所列《司马芳残碑》，认为与谢无量书迹甚为暗合。他的楷书与行书表现出一种自然天趣、稚拙率真的艺术境界，而俗眼不识，以为是“天才字”，而非真功夫。但于右任就称他的书法“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不如”。当初知音者鲜，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受到了当今书坛的追捧，认为达到“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境界，评为20世纪十大书家之一。

在四川著名的碑学书家中，还有余沙园先生，系成都人，为民国时期四川重要的一位书家，长期执教于四川大学等高等学府。在1930年举办的《金陵书展》中，获全国碑体书法第二而名重一时。当今书坛往往知其人而不知其生平，知其书而不知其来龙去脉。因此，本书把余沙园和碑学的先导者包弼臣一起作为专题介绍。

除以上所举的著名书家之外，同时期四川还有不少著名的书家，如顾印愚、张学潮、林思进、方旭、向楚、刘咸炘、盛光伟、刘孟伉、张大千等，他们都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四川书坛的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前面列举的碑学名家相比，或因书法个性稍逊，或因已经享有大名，在这里就不再作分别介绍了。

当概略地了解晚清至民国时期四川的书家群体后，我们会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思想上都倾向进步，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们或是参与、赞同维新变法，或后加入同盟会的民主革命，有了这种思想境界，在书法艺术上能接受碑学的新思潮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二、碑学思潮在四川传播时，

四川的书法家们并不盲从，对碑学和帖学互不相容的现象，一致地表现出清醒的态度：即赞同碑学，并不反对帖学。如赵熙先生所言：“凡天姿颖者喜南书，挟胜气喜北书。南多工而北多拙。拙近古而工近今。各有长短，相济而不相非，斯杰士矣。”^①四川著名的学者书家刘咸炘（1896—1932）还在1930年写成一部书学著作《弄翰余谭》，对晚清碑学和康有为等人的碑学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书中精义时见，给人颇多启迪。其中的观点，代表了这一时期四川书家主张碑帖兼融的创作态度；三、由于学术思想上的不盲从，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就富有独创精神。他们取碑与帖之长，弃碑与帖之短，碑帖互补，独创一体。虽然四川书家们艺术观念相近，但书法艺术风格却各异，均能自立门户，互不相似。以上三点，笔者以为非常难能可贵，促使了这一时期蜀派书家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

纵观中国书法艺术史，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西方照相术的东传和碑学思潮的发展，使书家们思想解放、眼界大开，获取了比任何时代更多更丰富的书法养料。书家们有了广阔驰骋的天地，故能变化出新，形成了多种个性化的书风，把书法艺术推向了一个兴盛时期。而在当今编撰的书法史中，把江浙一带的书法，特别是海派书法作为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得益于传媒之便，以至于全国都知道康有为、吴昌硕、李瑞清、曾熙、沈曾植、沈尹默、白蕉等，而同一时期的四川书家却在书坛默默无闻。事实上，四川书坛表现出的艺术水

^① 见余中英《赵熙书法序》，《中国书法》1988年第1期第11页。